



THE STIGLITZ REPORT

——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斯蒂格利茨报告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著
联合国金融专家委员会成员
江舒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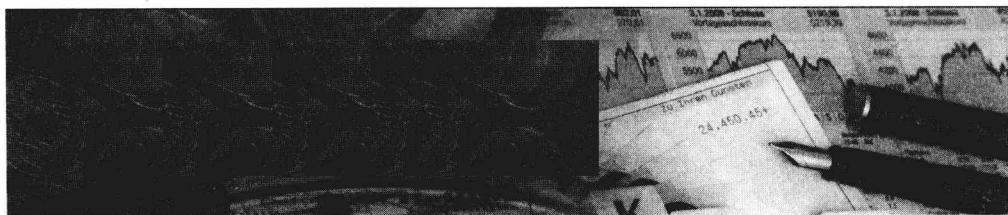


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

斯蒂格利茨报告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 (美) 斯蒂格利茨等著；江舒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011—9581—7

I. ①斯… II. ①斯…②江 III. ①国际货币体系—研究②国际金融体系—金融改革—研究
IV. ①F821.1②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76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0—5888

The Stiglitz Report

Copyright © 2010 by The New Press, Preface © 2010 by Joseph E. Stigli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斯蒂格利茨报告：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

作 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联合国金融专家委员会成员合著

译 者：江 舒

责任编辑：黄绪国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581—7

定 价：48.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序

2009年6月26日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高级别会议”上一致发表了一份广泛的实质性声明。从短期缓解到深入的结构改革、从危机应对到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改革等，声明中的分析和建议均有全面覆盖。本报告的重点在议程设定之上，几乎不包含以“可付诸行动的决策”的形式存在的可交付成果，不过为政策变化和体制发展设立了一个范围广泛，志向深远的议程。虽然，它是妥协和故意模糊的产物，但是其《成果文件》依然是关于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其必要补救措施的政府间声明中最为全面的。

此外，该《成果文件》还是对联合国成为一个不仅针对商议，还针对最高级别决策（思考并付诸行动，为普通人确定制度等高线）的论坛的可能性的强力佐证。这一切都是许多个人和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包括外交家和政府官员、来自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独立学术

斯蒂格利茨报告

专家。这份在六月联合国峰会上形成的《成果文件》利用了在以往多年内发生的国家和地区危机中积累的智慧资本。2007年8月以后，这些危机在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达到高潮。

该《成果文件》还体现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强大影响力。该委员会是我于2008年11月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主席的领导下召集的，其目的是协助联合国大会成员国讨论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本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本次金融危机的演变、本委员会的激烈内部讨论以及与成员国和其他当局之间的反复对话促成了本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尽管本委员会是一个非正式机构，但它却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委员会委员的良好声望和广泛代表性使其显得非常庄严。这20位委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累积工作经验不能以几十年来计算，而是几个世纪。他们为讨论带来了作为一流银行家、实践家、决策者以及学者的各种不同人生经历、观点，以及成功经验。此外，他们还愿意辛苦工作，愿意实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计划。

如同月亮对潮汐的影响一般，本委员会也对成员国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使辩论不拘泥于一些表面问题，而是注重于其有害影响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变得显而易见的系统性问题。他们通过提醒成员国来使其打开思维，大胆想象，因为他们在本报告的总结中这样说道：

在一个世纪里面，不止发生一次这样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出现了问题，它无法预见，更不用说避免了。相反，我

们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是人为的：它是私有经济所犯的错误和公共经济的政策失误共同造成的后果。

换句话说，委员会委员号召了联合国成员国承担起责任，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为谁承担责任呢？

全球经济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但是，问题到底有多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则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

根据被本委员会所采纳并在联合国《成果文件》中签署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意义上讲是系统性的，也是多方面的。从这一点来看，2009年9月在美国爆发的这次金融危机是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以及可持续性危机等并发危机中最近且影响最强烈的。在过去的35年中，这些危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通常是被迫的）的专横经济观点以重要的方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

根据这一观点，市场逻辑会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问题。众所周知，经济政策复杂性的主要部分，例如，需要说明造成经济不稳定的经济和非经济根源（“市场失灵”）、需要解释强加给他人的成本和纠正对社会效益的非法挪用（“外部效应”）、需要为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价值而进行公共干预（“公共产品”和“社会公平”）等均被视为经济管理中的偶然事件，而非根本问题。

当本委员会反复强调时，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理论和理念问题、体制问题、政策和实务问

斯蒂格利茨报告

题以及不太明显的道德和责任问题。本报告的本质观点是，当前的多重危机并非体系失灵的结果，而是体系本身——其组织和原理、扭曲和存在缺陷的体制机制等导致了这些失灵。

现在，人们习惯将今天的全球经济称为“经济”，而在更深层面上则习惯于将其看做一种自然现象，其公认规律必须与物理定律具有相同的顺从性。然而，报告却中肯地表示，我们的全球经济仅仅是许多可能经济类型中的一种，并且，与物理定律不同，我们能通过政治来决定所谓的经济规律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程度上应该占统治地位。

经济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更大生态系统中的人为部分。人为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维持或破坏生活条件。联合国《成果文件》和本报告均认为，现在必须将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认识到，全球经济体系必须调整至符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个时代里，经过数个世纪累积起来的风险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外，调整成本必须由现在和以后的数代人来承担。本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点上非常具有说服力：“未得到满足的庞大全球需求的同时爆发，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和消除贫困，对于这个生产过剩、失业严重的世界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包括魁奈、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均认为经济人、贪婪、情绪化纸板以及理论经济学的社会原子论构想是一种反证法。他们不仅仅假设人类的道德素养应该能反映他们的经济决策和经济体制。他们在许多方面坚持这一点。在今天虽然早已过时，但却更为必要。读懂这份报告虽然比较困

难，但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本委员会成员均赞同此观点。

全球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过程中最令人失望的一个方面就是几乎完全没有政治问责机制。虽然失败问题广泛、大量存在，但纠正措施却非常缺乏。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因于当前全球经济概念的影响。它是一种自然经济，因此也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既然概念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那么阴险的政治策略就可以转移人们对这些失败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者的注意力和问责。

另外还有一种补充解释，即我们的全球经济治理存在深层次的缺陷。根据民主原则，这些受政策严重影响的国家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而这些造成重大失败和损害的国家则应该承担责任。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并不满足民主治理的其中任何一种基本考验要求。

在某些国家看来，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诱因和必要补救措施进行梳理的这种想法似乎比较奇怪。毫无疑问，它们就是那些在当前制度安排中占据最优势地位的少数国家。而对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非常必要的。

人们对联合国是否应该为此提供一个平台的看法似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6月峰会”的整个筹备过程中，除了对那些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和外交家（他们谴责利用联合国的这种想法是“笑话”和“闹剧”）的话的大量文章和故事发表一些看法，大多数北半球国家都故意表现得非常沉默。联合国尚不具备此能力的这种论断在采用《成果文件》后美国代表团给出的

斯蒂格利茨报告

投票解释中表现尤其明显：“我们一致认为，联合国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一个合适的平台或为就文件中所述的大量问题，例如，外汇储备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等，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指明方向所需的专业知识或委任统治权。”

认为联合国缺乏处理体制改革问题的能力的这种看法在“6月峰会”之前的政府间协商（洽谈）会期间遭受到致命打击。当G7和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建议用“成员国”这种措辞替代“联合国”以任命谁将参与此工作时，这种小小的措辞变化便阐明并解决了实际问题，因为没有人敢说联合国成员国缺乏就我们共同的全球经济和整体存在的核心制度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的能力。

作为世界上唯一依法成立、具有全球包容性及明确委任统治权的政府间机构，联合国大会在全球事务的商议中扮演着特殊、独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提供了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在主权平等基础上自由发言和参与事务的平台，因此，这也是唯一一个让在全球经济治理理事会上未得到代表的发言能被听取并接受，但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权利。在这里，只有南半球国家的声音充满了平等的透明度，同时，这里也是公平和正义更可能被重视的地方。

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更加独到。由于联合国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得以建立的原始管理机构，以及联合国大会尤其作为联合国的方向性议事和组成机构，所以，对商议全球体制改革来说，联合国大会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平台。

在去年的很多时候，我引用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此外，我还从圣雄甘地的生命和教导中得到了启示。他曾经说：“开始他们会忽视你，然后会取笑你，然后攻击你，最后你就是赢家。”甘地认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并非简简单单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是为真理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必须本着团结友爱的精神承担起责任，甚至还要为反对和企图摧毁我们的人承担起责任。

《专家委员会报告》和《6月成果文件》均是用以在联合国或通过联合国继续为真理而斗争的邀请，甚至可能是劝告。联合国的缺点就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必须接受，不过，改正这些缺点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想借此机会向斯蒂格利茨教授和所有名字记录在此的委员会委员、大会报告起草人简·克雷格尔以及我的私人代表弗朗索瓦·浩达先生和阿里·布卡米先生致以最深的谢意。他们所有人在工作中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奉献精神和诚意。此外，这一切还与吉尔·布莱克福德女士的高效管理和明智的建议，以及阿琼·贾亚戴夫先生和弗兰克·斯罗德先生的编辑工作密不可分。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有关人员的志愿服务，尤其是曼纽尔·蒙特斯博士和理查德·科祖尔·赖特博士，在本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和关键阶段为我的工作提供了重要信息。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工作人员：高级顾问保罗·欧奎斯特博士、迈克尔·T. 克拉克博士、拜伦·布莱克大使、尼鲁帕姆·森大使和阿尔波·鲁西大使；以及由副主任爱德华多·曼葛斯、路易斯·纳桑特·席尔瓦先生、拉希德·瓦利先生、克劳蒂

斯蒂格利茨报告

亚·巴伦苏埃拉女士以及埃斯佩兰萨·艾斯柯西亚女士领导的支持团队；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的所有同仁，包括大使兼办公室主任诺曼·米兰达和大使兼办公室副主任索菲亚·克拉克。凡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某个任务时，他们都随时准备好了全力以赴。

另外，若干政府和机构还提供了一些财政和实物援助，对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帮助。在此，我特别想感谢阿尔及利亚政府、中国政府、德国政府以及荷兰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及时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那么我们就无法将委员会的艰巨工作计划坚持到底。国际议会联盟为3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慷慨地提供了会议设施。在此，我特别要感谢国际议会联盟秘书长安德斯·B·约翰逊先生和国际议会联盟的萨利·安妮·萨德女士。在他们的努力下，委员会变得广受欢迎，会议也卓有成效。

荷兰发展合作大臣伯特·库德尔斯阁下作为东道主和联合国大会主席驻欧洲特别使者的亲身投入非常广泛和高效，因此，他应该成为本委员会的荣誉委员。此外，荷兰外交大臣戈本·普朗庭先生和珊娜·赫尔德曼女士也在关键时刻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有这些人帮助我们从一点点可能性开始排除重重困难，以便摸索出日后实际工作的具体框架。此外，他们还作出了无私奉献的榜样，并希望我能继续鼓励其他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
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

前言

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清楚，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会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发生于2007年8月的早期震荡就对距美国千里之遥的印度尼西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很显然，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全世界的响应，但是，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却未充分完成它们的使命。实际上，它们中的一部分推出了宽松的经济政策以及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而正是这些导致了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自由市场可以产生高效、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一理论也站不住脚。所以，事实证明，市场会进行自我调节这一观点同样是一种悖论。然而，这些观点曾经在某些国际经济机构中非常盛行。

当然，这并不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就在十多年前，东亚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在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便围绕国际金融体系这一问题进行

斯蒂格利茨报告

了大量的讨论，然而，他们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为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机构——“金融稳定论坛”（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不过，该论坛依然受那些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模式和理念的影响，毫无疑问，最终也未能阻止比上世纪末给世界造成重创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这次危机。

很显然，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超过了政治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全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事件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深刻的影响。全球化意味着需要采取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集体行动，使世界上所有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通力协作。为此，还要保证一个国家不会采取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的行动。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世界本应做到这一点。

呼吁全球协作

既然危机业已发生，那么就迫切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确保经济迅速复苏。由于我们把重点主要放在第二章，所以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刺激本国经济会使其他国家受益，因为这个国家扩大了进口。强力的经济刺激会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效应，然而，这也会使其他国家产生“搭便车”的投机想法。更为糟糕的是，各个国家可能为刺激本国经济而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即所谓的“以邻为壑政策”，该现象在“大萧条”时期发生过。解决此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通力协作，共同提供巨大的全球性经济刺激。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这种援助不

仅来自人道主义，而且还源自利己原则，因为如果世界的一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那么全球经济很难保持持续性复苏。而且，这种不平衡的复苏还可能使全球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前几年里，它一直威胁着全球稳定。

不过，这里还存在一种“道德负罪感”，即发展中国家成为了美国经济调控的无辜受害者。

美国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具有道德负罪感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它们在没有提供任何适当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将自由化政策强加于这些无辜的发展中国家之上。这些政策将发展中国家暴露于巨大风险之中，而它们却依然没有应对后果所需的资源。发达国家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它们的公民应对危机并稳定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却有心无力。

造成这一后果并不能仅仅归罪于发达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更广泛地说，金融市场在鼓励发展中国家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些政策使银行受益匪浅，但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就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工业国的一些银行将货币以援助资金的形式涌入到东亚。因而，本国银行就不必承担失误的代价，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纳税人最终为财政援助提供了资金，也就是向为银行提供援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机构偿还银行的债务和利息。然后，它们在援助、低价甩卖东亚公司的过程中再次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IMF为其援助所要求的代价。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些银行再次得到援助，不过，这次的援助者却是美国和欧洲的纳税人。

斯蒂格利茨报告

最后，如果我们不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再次遭受这种金融危机，那么就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新的经济调控标准，因为旧标准显然已经失败了。自宽松的金融监管时代开始以来30年的时间内发生了100多次金融危机，而本次金融危机是对世界造成重创的金融危机中最严重的。而就在之前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半个世纪里面，整个世界似乎从“大萧条”中吸取了教训，采用并实施了强力的调控措施。除非真正采取一些措施，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发生更多的危机。

表率作用：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

很显然，我们在广泛的阵线上需要国家间的协同合作，但谁又有能力或会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呢？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的宏观经济理论存在缺陷，并导致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此外，布什总统还一直在阻挠多边主义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是G7或G8这样的小集团能应对得了的。而且，应对危机需要大量的资金，但主要的资金储备都集中在亚洲和中东等集团之外的这些国家。

以前，IMF对全球金融体系提供过援助，不过也不太适合这种情况。毕竟，它既没有预见金融危机的来临，也没有在预防金融危机中履行应有的职责。此外，正如我此前指出的，IMF之前还因在发展中国家推行那些政策而广受诟病。鉴于IMF以前对待向其寻求帮助的国家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借债国并不愿意求助于IMF。IMF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援助，拥有大量资金的中东和亚

洲国家也对它持怀疑态度。毕竟，IMF主要还是受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工业国（美国依然是唯一具有否决权的国家，而且欧洲国家也总是唯命是从）左右，也正是它们造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有两个国际机构参与了进来。自从10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以来，G20的各国财政部长一直都定期举行会晤。现在，在欧洲领导人的提议下，G20成员国也晋升到领导地位。然而，世界上一共有192个国家，也就是，还有其他172个国家仍然没有发言权。而且，虽然G20的GDP占全球GDP的75%，但它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和政治合法性。某些国家进入这个“集团”还尚在情理之中，但是为什么其他有些国家也在其中或者说有些国家不在其中却让人无法理解。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小国家尤其感到愤愤不平。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赫然在列，那就是南非，但是，它几乎无法代表与其大相径庭的其他非洲国家。

专家委员会的成立

联合国就是一个有权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团结起来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大会主席认识到了联合国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于是，他呼吁就本次金融危机开展一次峰会或高级会议，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但是，他担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得不到太多的关注。然后，他便让我来领导一个专家委员会，目的是就本次金融危机拟定一份独立报告，以及为峰会拟定议事日程。

专家团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例如，他们可以直截了当地

斯蒂格利茨报告

对原因进行分析、不必用外交辞令推脱责任等。在策划应对措施时，他们可以集思广益。有些想法可能不会得到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因为它们可能会妨碍某些特殊的重大利益。虽然这些想法不会马上转化成政策，但有助于为日后拟定议事日程。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这个专家委员会和G20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并未将其视为对手，而是相互支持。最后，必须通过整治程序来作一些决定，此时，专家团便可以帮助设计这些程序。

专家委员会由联合国大会主席成立于2008年10月。

委员会成员

在召集专家团时，我们力求获得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这虽然会让大家达成一致更加困难，但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一致将会更具意义。我们很高兴我们所接触的每个人都愿意为委员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他们各自都公务繁忙。对本委员会的潜在重要性，他们均深信不疑。

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久经危机的专家，例如，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扎蒂女士。在10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她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马来西亚更加迅速地从那次危机中摆脱出来，背负的债务也比其他东亚国家都要少。甚至就在危机来临之前，马来西亚已经在处理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方面表现出了足够的智慧。他们坚持让银行及向银行贷款的公司不过分受外汇风险的影响。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负责日本国际事务的财务省次官神原